

中文版序言

我们这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到了1998年因初版已售尽,出版社便又重印纸本,以供应用并广流传。原书是用英文写的,由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刊印,共五百多页,是一本相对来说既重又贵的书。到了2005年,北京清华大学李伯重博士来密大任客座教授,乃建议将此书译成中文,并托加州理工学院王湘云博士负担译事,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慨允将译本尽快印出。湘云长于译事,快于译文,陆续将全书于2006年秋译竣,但当时我们各忙于他事(雪伦正在写她的明代的帝国与社会的专书,春树忙于校正《中华帝国的兴起》的新刊两册本),所以一时不能抽空细为校正译文。至2007年春,我们乃开始将译文校改加添。数月以来,专于此事,终于完成任务,全此工程。

不过现在这个本子,已不全是一本译书,而可以说是一本旧文新书。何以如此,原因很多。原书是外文写成,立意构文皆与以中文写书者大不相同。一个真有学问的学者读一部从“真”的译书,总是会格格不入的。如果以“典”“雅”为的,则又失“真”,也是不成。其次,我们的原书所涉及的学科太多太广,有文、史、哲等科,也有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宗教各门学问,还涉及自然科学与医学(细节可见本书“导言”)。因此,专用术语与各类各种名词也特别繁多,所以选择适当之译文与译名甚为费时。而

且有些语句在国内尚未普遍应用与诠释过,因此也就更加费时费力去考究斟酌。最后我们做来做去,想来想去,乃决定重新安排全书章目,并修改译文中某些字句、词语,如此便成为一本适于国人阅读的新书了。

不过材料方面,则仅是稍有增改,并无大变动,因为这本书的总体结构,所用分析概念与方法,广引明清当代通俗史料等等各端,都是当时的“新史学”研究开路先进的,所以这些年来未见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问世。就从这本书之总结论来说,近年也未见有新义之著作发表。当然,在本书所论及的某些个别科目与问题来说,如明末之物质文化、明清时代之文士与思想家、个别科学家、明清之际的政治与动乱等等,中外文中都有些新作,但与本书无直接关涉。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像我们这种研究,必须先要贯通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各主要科目才能入手,但这种多元吃力的工夫似已无人愿意坐熬了。

这本书原著之完成得益于多国多地之图书馆特藏珍本善本,各方各门学者之指教与批评,许多大学与研究机构之多种奖助金,我们对这些“学债”都曾在原书中一一表谢,在此我们也就不再重述了。对于本书之出版,是全靠及门李伯重教授的商洽与安排,译事则为王湘云博士所尽全力美成,我们对他们真是有说不尽的谢意。我们甚为钦佩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立翔先生大力促进现代学术交流之远见与硕学,更万分感谢他慨然将此书刊印,使我们与中文世界的学者们有此求教的机会。

张春树、骆雪伦
识于密州安城枫雪斋
2007年5月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导言 / 1

绪 论 李渔其人及其世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1

一、历史形象与文学评价 / 2

二、社会价值与文学批评 / 7

三、道德、人品、文学 / 14

四、李渔其人、其事与其社会 / 25

第一章 政治社会的变革以及个人的反应:过渡时代中

李渔的生平事迹 / 31

一、攀登成功的阶梯与挫折:明朝时代的李渔 / 32

二、破灭与醒悟:明清朝代兴替与个人世界 / 43

三、清朝统治下的秀才遗民与职业作家:明朝士人 / 49

四、李渔在南京:集学者、作者、出版商、企业家于一身 / 62

五、“落叶归根”:新朝、异族、故人与旧地 / 81

第二章 明清时期的危机与蜕变:朝代兴替与经济革命

中的新社会与新思潮 / 91

一、士人与政权:“士民”阶层与朝代的更替 / 91

二、兰溪和金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特征及
地区的文化—思想传统 / 95

三、晚明社会文化的转变:作家及其社会环境 / 110

四、自由创新及个人主义:李渔的文学思想的主脉 / 126

第三章 戏台与阁台之间:李渔剧作中所反映的国家和社会 / 143

一、朝代转换,历史戏与爱国主义 / 144

二、深思王朝的衰落和灭亡 / 148

三、社会风俗与经济境况 / 156

四、戏剧作家与忠节问题的探讨 / 170

第四章 小道与大道之间:李渔小说中所反映的个人和社会 / 174

一、李渔的小说:真实性与内容 / 175

二、《无声戏》的世界:社会形象与个人精神 / 185

三、《十二楼》:爱情、人性与社会 / 189

四、新社会、新经济与新文学:白话小说的价值与功能 / 201

第五章 明清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危机和思想革命:

从历史角度看李渔的世界 / 204

一、崩溃中的帝国 / 206

二、晚明社会的都市化、男风及民间宗教 / 211

三、李渔思想中的理性批判和实证观念 / 220

四、晚明时期新的思想发展和“科技革命” / 225

五、李渔及其时代 / 246

结 语 李渔的世界的现代性:政治变迁与社会文化蜕变之中的个人 / 248

一、个人与朝代转换 / 248

二、思想秩序与政治秩序 / 256

三、“现代性”时代的挑战 / 274

征引书目 / 280

中文日文书目 / 280

西文征引书目 / 303

导 言

一、研究范围与主题

17 世纪后半期(约 1630—1700)的中国正处于明清改朝换代的关键阶段,本书研究的正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国家。^{〔1〕}本书主题即围绕因这三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爆发出的巨变,这在李渔的生活和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李渔(1611—1680)多才多艺,富于创业精神,集学者、作家、出版商于一身,他在求生存、做学问和创事业等方面的各种亲身经历恰恰是他那个时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文学等变革的生动写照。

〔1〕“朝代转换”(dynastic transition)这个词的含义不单是指权力由一个王朝转移到另一个王朝,而且也是指在这当中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转换带来的所有变革。它囊括了从一个旧朝代衰落的致命伤开始直到新政权的巩固这样一段颇长的时间跨度。有时,这个转折需要持续几十年。从明到清的转换始于 1630 年持续到 17 世纪末,共约 70 年的时间,这就是本书要研究的历史时期。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文学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代转换”一词在本书中除了政治和军事的意义以外,其他这些领域也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在说“明清转换”或“明清之际”时,不仅是指一个朝代变迁的过程,而且也包括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李渔生活在 17 世纪的前中期。当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乎无一不在起着巨大的变化。政治上王朝秩序的危机是变化的主导因素,当时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变更、社会文化的革命、科技革命的开端,以及思想界、文学界的骤然转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变化包括:工商业蒸蒸日上;人丁繁衍兴旺,都市化日见显著;人们对于金钱、财富、奢华的看法产生了激变,大为背离传统上主流的价值观;在生活上开始追求舒适与享乐;衣饰时尚和休闲娱乐趋于商业化;对待女性的态度和方式焕然一新;对于性行为和同性恋开始容忍;在学术研究中也出现了科技创研的新时代;出版业日益兴盛,民众识字率因之增高;知识开始普及,思想家和文学家采用大众传媒者日益增多,文学理论的重点也转向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前提。^[1]因此,中国整个的思想世界濒临根本性的改变,对于人生、休闲、繁荣、工作、性行为及自然界的看法等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规范亦是如此。尽管其中某些变化有其不同的发展过程,但是到了 17 世纪中叶,所有这些变化都达顶峰,共同为产生一个新中国以及一个强调进步、经商、科技、物质设备的新的中国思想世界提供了条件。李渔的生活、思想及其整个行为模式不但是在这些变化中形成,而且也反映出了这些变化;事实上,他的生活是这个过程的个人化,体现的是他同时代人所称的“巨变”的具体内容。而且,所有这些主要变化全都可以在李渔的生活和事业中找到踪迹,正是因为他一身兼数职,既是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植物学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商、建筑学家和发明家,又知识广博,精通卫生、烹饪、饮食、娱乐、园林、室内装潢、商业管理、戏曲和绘

[1] 此处所用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颇易引起麻烦和争议,在我们的研究中所指的是在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活动中所发生的根本上的变化或根本上的新发展,这种变化不一定都发生得骤然急剧。但从政治上来看,仍存有剧变这一含义。关于“革命”一词含义的历史、演变,并从不同层次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理解,见 Eugene Kamenka, “The Concept of a Political Revolution” (《政治革命的概念》), 载 Carl J. Friedrich 编 *Revolution* (《革命》, New York, 1966), 页 124;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关键词》, New York, 1976), 226—230; Charle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革命性的变革》, 2nd ed., Stanford, 1982), 66—73; 以及本书第五章关于这个名词的讨论。

画。但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不朽的作家,他又是把生活当作艺术的专家,这就是李渔一生的特色。

身为作家,李渔的杂文随笔、诗词、批评、戏曲和小说,可以说是样样出类拔萃。他的作品既有文言,又有白话。他的文言笔记、白话小说、文白合璧的戏曲使他在生前就成为一位妇孺皆晓的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作家,他以写作作为自己谋生的职业和生意的手段,通过写作取得利润,运用一切可能的经商技能和方式,公开寻找赞助人,追求成功和名声。他有自己的出版社(即有名的芥子园)来印刷、宣传和发行他本人的作品。他证明了自己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职业作家。虽然在李渔之前或李渔同时的“前现代”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作家由于环境所迫而受人赞助或以卖文为生,但是却没有人像李渔这样公开地谋取利润并享有空前的盛誉。在独尊儒家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环境下,文学作品被当作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对于绝大多数传统文人来说,为钱为利而撰写文字这样的想法简直就很卑贱。〔1〕李渔不墨守成规而能被他同时代的人(学者、作家、仕宦)所接受,这一事实本身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文人墨客的确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

然而,李渔独树一帜并大受欢迎的现象似乎并不持久,而且很快被人遗忘。他没有在随后的清朝文学界得到尊敬,这点我们在“结语”部分还将讨论,这种现象源于清朝统治下的18世纪乃至终清一代,儒家

〔1〕对于传统的中国士人的深入研究,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名著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I: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一卷《知识连续性的问题》,Berkeley, Calif., 1968),第2章,页15—43。还可参看列文森,“The Amateur Ideal in Ming and Early Ch'ing Society”(《明代与清初社会业余爱好者的理想》,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编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Chicago, 1957),页320—341。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阶层的详尽解释,见何炳棣(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 ~ 1911* (《中国科举制度及社会史的研究》,New York, 1964),页1—52。一般说来,列文森才华横溢,而他在上述这篇文章中说,在明朝和清初的中国,由于科学受不到重视,进步被否定,经商被蔑视和限制(可能是越来越难),因而士绅们成为保守的非专业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但是我们这个关于明清之际的中国的研究却与他的论点恰恰相反。仅需指出一点,列文森的观点是1957年发表的,他所依据的资料现已过时。

地位重新得以坚实巩固而产生的影响。所以,把李渔作为我们研究的课题,原因归结起来有二:其一,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但随后在清代文学界失宠,因此,他是一位很特殊的历史人物,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找出很多有关他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其二,李渔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和生平资料,使我们能够据此具体而全面地描绘出中国历史上这个“巨变”时代的进程、步骤及其细节。此外,他的生平也是他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改变的关键时刻的真实写照。李渔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戏曲和杂文笔记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资料。在此,我们以为有必要概括一下他的文学作品的性质、结构和写作目的。

在 17 世纪下半叶,李渔的小说、戏曲和杂文笔记被广泛阅读或搬上舞台,十分流行,格外出名。但我们的兴趣不在这些作品内在的文学品质和价值。我们相信,由于李渔认为文学应当成为大众的乐趣,反映大众的观点,因此他的作品可以提供给我们他对其所处社会和时代在精神、感觉、价值、态度、意识、梦想和幻想等方面的灼见,这在传统的历史文献中一般是见不到的。我们研究的主要目标首先是李渔本人及其时代,然后探讨他的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范围和深度,包括他全部的作品,尤其着重他的小说、戏曲和文章。另外,我们也把李渔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做一比较,为的是能深刻地了解李渔如何对待文学,他的写作方式和思想特点,他有哪些与人共同的传统继承,又有哪些个人的独到之处。

二、行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本书旨在把文学、思想和社会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扩大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我们试图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探讨“文学与社会”这个新天地,主要利用文学材料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或阶段的历史和社会进

行分析。^{〔1〕}我们认为文学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而其价值在于作家感触到某些类型的集合能量和活力后,即用文学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阐明的将会大于文学本身,将在个人的和历史、文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去探讨在文学之中的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又通过个人的生活、作品、思想和行为来描绘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2〕}在本书中,李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而明清之际的中国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社会;李渔的作品囊括所有文学的形式和类型,经过他的想象和艺术过滤之后所记载下来的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文人关切的问题,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关键的资料。李渔的著述综合起来可说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正在经历革命性转变的社会的生活图像,既独特又具代表性,既真实又具概念性,既概括又极具个性。这样,对李渔进行生平、文学、思想的描绘就与对那个社会进行历史的描绘很理想地融合在一起了。

本书是历史的而不是文学的研究:既不是李渔的传记,也不是直接对明清易代作宏观的历史分析,而是通过对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思想、文学和事业的微观考察,进而宏观地展现出那个非常重要的巨变时代。

在对李渔及其社会的研究中,我们也观察李渔周围的人及其友人的

〔1〕 我们共同研究这个课题已历时二十余年。本书是这项长期研究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更大项目的一个部分,即《明清之际中国的文学与社会:文人与朝代转换,1630—1700年》(*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Ming-Ch'ing China: Litterateurs and Dynastic Transition, 1630—1700*)。这项研究项目始于1960年代后期,1971年成书。李渔是该书第三章讨论的对象,其他作家包括李玉(约1591—1671,第二章)、蒲松龄(1640—1715,第四章)、洪昇(1645—1704,第五章)、孔尚任(1648—1718,第六章)以及一些短篇小说的作者。我们在修订的过程中,大大加重了各章的分量,其中有两章扩展成书。其中之一便是本书;另外一本是关于蒲松龄的,题目为《清初士人教育与通俗文化》(*Redefining History: Ghosts, Spirits, and Human Society in P'u Sung-ling's World, 1640—1715*)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文稿的其他部分仍在修订。但那本书的大多数章节都已在各种期刊或文集上发表。值得指出的是,书中第一章“明清时期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一些内容已经在两次学术研讨会上分别发表过(“Symposium on Wen Cheng-ming, 1470—1559”[文徵明研讨会],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rt, Ann Arbor, Michigan; January 1976, & “Symposium o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Wu [Suchou]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16和17世纪苏州绘画书法研讨会], Memphis Brooks Museum of Arts, Memphis, Tennessee, September 1984)。关于李渔及其时代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想法,也曾在1981年多伦多举行的第33届亚洲学会的年会上发表过题为《17世纪的中国文人与社会:蒲松龄、孔尚任和李渔》的论文。

〔2〕 关于我们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方法论及理论架构,详见“结语”结尾部分。读者可引证参考。

生活和思想,并探讨实际影响和形成李渔个性、想法、行为的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从事的这项综合研究较为复杂,运用的资料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史料,包括各种具有真实性与高度学术性的材料;第二类是中国传统上所讲的甚为广泛的文学资料,包括创作文学(长短篇小说、戏曲)、个人写作(日记、信件、自传性记录)、文史评论(泛称“集”和“笔记”)以及个人文集(主要是诗与各种形式和文体的文字);第三类包含的有艺术作品(绘画、书法、专门的碑刻、素描、图示设计等等)、古董,及一般归为通俗文化的材料,诸如节目单、戏单、各种形式的大众话本与合集(说书、歌曲、舞蹈、吟唱等等)、书刊广告、对群众宣传用的政治和宗教小册子、训诫、漫画、图画游戏卡片之类。在上述三类资料中,第一类很标准,无需多作解释,但是第二和第三类代表了我们进行探讨和解决问题时所用的独特研究方式。在这方面,我们所采用的16和17世纪中文史料不仅在数量上比以前都多,而且这些史料此前大多从未被发掘过或被系统地利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这些史料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17世纪中国的脉搏,好似亲眼见到李渔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亲耳听到那些行动产生的回声,这些史料令人更加赞叹明清时代中国的转变与进步、多样与差异、和平与战争。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认真解读与具体分析,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正处于无可比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转折和文化变迁的中国,而且也能够看到前所未见的思想文学革命的先决条件也已臻成熟。

我们探讨的方法论是多学科的,既提出解释性的见解,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以及宗教学的分析方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证实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在探讨历史问题时,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进行融洽的结合是有益的,虽然这两大领域所用的方法常常被各自的权威学者们看作不相通和不调和的。我们的成果清楚地显示这种新的学术探索方法能够使学人扩大视野与研究区域,我们称之为“综合历史研究法”。

总之,本书从更具体的一时的视角来叙述明清时代一个人物的生平和事业,以此阐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及思想—文学上的变化相互之间的复杂互动及深刻关系。^{〔1〕}从一个更为广阔和漫长的历史和历时的视角(historical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来看,它显示了在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中国实行现代化的局限性和断续性,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在 19 和 20 世纪中国实行现代化时所遇困境的中心议题。

〔1〕 虽然本书主旨不在传记,但由于这是首次对李渔的生平和思想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研究,因此,如果说这是中外各种语言中对李渔最全面的传记式分析,应是当之无愧的。此前关于李渔的研究都是专门做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检验,并未考察李渔的生平及其著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绪 论

李渔其人及其世界：个人 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明清朝代转换时期的名士当中,李渔^{〔1〕}(1611—1680;以“笠翁”之号享名于世)的一生突出地体现了那个时代非同寻常的社会文化的蜕变,他的思想与作品代表着晚明时期浪漫主义、经验主义及个人主义这三个最重要的思潮。李渔可以说是时代造就的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在明清转换之际迫于环境以写作谋生,著作甚丰。就像大多数传统时代的小说家和剧作家那样,对他的文学成就的推崇并没有持续,情况直到20世纪初期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时才有所改观。其他的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一旦被接受就会享有普遍声誉,可是李渔文学上的名声在中国却总是成为争议的对象。一方面,他那新意盎然的戏曲批评及其成功的戏曲作品到1920年代末期都已得到肯定。自那时以来,他的白话小说也得到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的高度赞赏。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些权威人士仍旧对李渔写的小说持否定态度,在其研究中指责它们“有毒”。当代中国尚未对文人李渔作出一个公认的公允的客观评价。

李渔作为一个文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这种现象颇为特殊。这不

〔1〕 李渔原名仙侣(号天徒,字滴凡),又字笠鸿,号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觉世稗官、觉道人、十郎等。

仅反映了李渔本人的性格和行为,而且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总体情况。李渔极有个性,做起事来与众不同,常常标新立异,有时与当时文人遵循的儒家正统观念大相径庭。所以在当时一些道学家带有偏见的记述中,李渔给人的印象是个放荡才子,被塑造成了有名的淫秽作家这样一个历史形象。由于古今中国社会都倾向于把个人的成就与他的道德举止联系起来看待,因此,既然李渔本人得不到公正评价,那他的文学艺术也就得不到客观的欣赏。对李渔评价的不一致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在范围更广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文学、社会、人物的统一体;对个别人物的探讨实际上只是整个道德系统的一个变数。对李渔文学的评价和结论表明中国人的价值系统是以其最典型的特色而操作运行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古今中外对李渔及其文学作品的各种不同评价。我们意在详细分析李渔的生平及其社会和时代之前,先把以往对李渔本人的生平资料及其文学的主要思想的研究作一概括介绍,希望能通过纵向的时间跨度的比较以及横向的中国、日本、西方文化跨度的比较,使得一些关键议题呈现出来,以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

一、历史形象与文学评价

现代中国对于作家李渔的成就所表现出的不公允与偏见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正统的儒家学者对李渔本人评价甚低,如董含(约在1630—1697年间活动)在《蓴乡赘笔》(1644—1697)中写道:

夫古人绮语犹以为戒,今观笠翁《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当堕“拔舌地狱”无疑也。^{〔1〕}

〔1〕 董含:《蓴乡赘笔》,录入《说铃》(台北),卷2,页1021。

董含说李渔有伤风化,这样一个形象一定在与董含同时并与他持有同样伦理观的文人当中有着广泛的认同,因为据《李渔传》所载,李渔当时是闻名于世的。还有一些说法也与董含大同小异,可以证明这一形象。^{〔1〕}其实,董含批评李渔的诗文集《笠翁一家言》“坏人伦、伤风化”不但没有根据,反而说明董含自己从未认真读过《一家言》。显然,董含对李渔的诋毁是源于儒家道学的主流文化与实用开放的新兴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董含出身权贵之家,熟读五经四书,1661年举进士,自认是正统儒家文化的传道者,是已确立的儒家价值观的卫道士。在董含看来,儒家学者必须遵循基本的儒家伦理和功名事业,包括(1)以农为本,经商则有损个人道德;(2)文以载道,文体当取说教式,内容一定要讲求道德;(3)个人行为必须符合儒家规范,诸如忠、义、勤、俭、忍,以及自我节制,不求奢华享乐。所以,当李渔公开表示经商发财,组织家庭戏班创收利润,撰写煽情的通俗小说来赚钱,纵容物质奢侈和感官享乐,随心所欲谈论性爱及其两性关系的开放,这些都触犯了董含所主张的基本的儒家思想意识。他自然要对李渔表示蔑视,甚至盲目指责李渔,也就是说,当任何人的价值观只要是倾向于个人化的新兴文化时,那么董含这类人都会提出批评;而这种新兴文化产生于城市中,其特点是在事业追求和生活价值上都主张个人主义、思想开放以及物质上的实用主义。^{〔2〕}

董含给李渔的评价如此低下,也与当时正统的儒家学者当中流传的有关李渔的轶闻交相呼应。例如,刘廷玑(约1655—1715年以后)的《在

〔1〕 见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台北:1965年再版),卷1,页333;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载《李渔全集》,马汉茂(Helmut Martin)编(共15卷,台北:1970。此后注作《李渔》),卷15,页6640。青木正儿引自袁于令(1592—1694),在《李渔》,卷15,页6640。孙楷第引自董含,但略有出入。袁于令又与董含稍有不同。

〔2〕 李渔《一家言》录有17种形式的79篇散文随笔,14篇赋,109封信件,1675篇古诗歌,及179副对联等。文集涉及的主题广泛,事件繁多,然而无一像董含所批评的那样。相反,李渔一些作品的道德观念还颇强。我们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页121—127)中的“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与“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这两个术语。主流文化指的是在一个社会已经建立并起着作用的正统文化;新兴文化是指一种仍在发展的文化,正在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以及新的关系。

园杂志》(1715年“序”)谈到有关李渔的轶闻。李渔居京之时曾在其它门上贴了一个条幅,上书“贱人居”。李渔这是表示谦虚,却有人嘲笑他,在对面的宅门上也贴了一条,上书“良者居”。据刘廷玑所言,此处“良者(妓女)”是指李渔的女伴侣。而《在园杂志》一书正是第一个把《肉蒲团》这本有名的色情小说说成是李渔所写。^{〔1〕}虽然除《在园杂志》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根据,但是此后李渔就被认为是《肉蒲团》的作者了。

李渔同时代的人直言不讳地描述李渔一些违背常规的言行,妨碍了后代史家和学者对李渔本人及其文学成就进行公平的评价,原因是自18世纪起,有悖儒家正统的思想和行为所受到的政治压迫愈来愈厉害。甚至连李渔生前居住地的方志也往往不从惯例,在当地名人传中不把李渔写入,如康熙《钱塘县志》和嘉庆《钱塘府志》均对李渔只字不提,而李渔在钱塘(杭州)和江宁(南京)两地居住达三十年之久,他的杂剧、传奇和小说几乎全是在这两地发表的。1777—1781年间由黄文暘等人所编的名著《曲海丛目提要》也属于文人没有公平对待李渔的一例。尽管《提要》收入李渔的杂剧和传奇高达十篇,对李渔生平的介绍却仅26字,说他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不过是个“俳優”(戏子)。^{〔2〕}由于俳優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低下,这样评价实际是对李渔极大的贬低。

正是由于对李渔存在着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在清代几乎没有他的传记。例如,在被当代学者认为是标准的传记参考资料的三十三种清代重要传记中,关于李渔的仅一短篇,尚不足60字,见于李桓《国朝耆献类征》。^{〔3〕}在包括李渔的为数很少的传统传记中,1888年出版的《光绪兰溪县志》最为详细,也只有两页,并未提到他的生平、家庭背景、个人

〔1〕 刘廷玑:《在园杂志》(台北1969年再版),卷1,页22下。

〔2〕 关于清人对李渔生平材料的传统介绍,见《光绪兰溪县志》(1888,台北1974年再版),4:1299—1300,7:2177—2178;《新登县志》(1922;台北1974年再版),10:3254;李桓:《国朝耆献类征》(1884,台北1966年再版),卷426,页46。黄文暘等编《曲海丛目提要》(台北1967年再版;2:995)对18世纪杂剧剧目的注释中有一条注是关于李渔的。

〔3〕 关于这33种文集,参看杜联喆和房兆盈《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北平:1932),Ⅱ;《李渔传》,见《耆献类征》,卷426,页46。

经历等情况。^{〔1〕}但是此篇传记尚称客观公允，肯定李渔是位多才多艺的名士，与李贽（1527—1602）、陈继儒（1558—1639）这两位晚明时期最享盛名的名士齐名。

李渔的确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位剧作家和小说家。尽管他的言行举止和经商模式太不符合他那个时代正统儒家的道德规范，会不时引起某些傲气十足的腐儒人士反感；但与此同时，他也受到当时一些名士的赏识，其中有钱谦益（1582—1664）、贾汉复（1606—1677）、吴伟业（1609—1672）、尤侗（1618—1704）、宋琬（1614—1673）、施闰章（1619—1683）等人，这些学者或者受明清之际新文化的影响，或者持容忍理解的态度。钱谦益这位 17 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文宗”，实际上把李渔的小说和传奇置于与流传最广的小说《水浒传》、《金瓶梅》及明代最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1550—1616）的传奇剧同等高的地位。^{〔2〕}李渔在文坛的成功，他与文坛名士和社会名流之间的友谊，事实上是文坛和学界对他可以接受程度的极好衡量；而对他的接受这一点即可反映当时社会文化的巨变。

然而，李渔的成功却如昙花一现般没有能够持久。李渔在明清换代所造成的政治动乱中得以生存，却又成为 18 世纪历史时局的受害者而被毁誉。到 17 世纪末，随着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逐步走向巩固，在政治上推行程朱理学以加强控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变得越来越刻板压抑。1630 至 1700 年间明清转换之际那种思想开放、道德宽容的气氛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对正统儒家道学的强调。清朝统治者坚信程朱理学的道德教化是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开始大力推行所有的正统儒家的伦

〔1〕 详见《光绪兰溪县志》，4：1299—1300。关于有关李渔的传统传记的概况，见孙楷第《李渔》（15：6621—6679，特别是 6622—6624），《李笠翁与〈十二楼〉》。

〔2〕 参钱谦益《牧斋外集》，载周法高《九家诗文集》（台北：1974），卷 6，页 2614—2616；卷 25，2868—2869。钱氏文章作于 1661 年杭州。文中提到的贾汉复、吴伟业等人，见本书第一章。《水浒传》和《金瓶梅》均属于中国最有名最出色的好小说。最近，帕克斯（Andrew H. Parks）《明代四大小说》（*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1987）一书的第 2 和第 4 章对这两部小说予以赞赏。汤显祖被认为是明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见夏志清（C. T. Hsia）“Time and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 Hsien-tsu（《汤显祖剧中的时代及人文条件》）”，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载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编，New York，1970），249—288。

理价值观。他们特别强调忠君：大肆表彰忠烈，忠烈人家得到非常高的奖赏。不仅如此，在 1777—1793 年间编撰出版《贰臣传》，连清初与清廷合作的汉人此时也被视为“贰臣”。在地方上，鼓励官员们大立牌坊表彰各种人物，如不二嫁的好女，为父母吃尽苦头的孝子孝女等等。更有甚者，清廷的 81 次“文字狱”使得数百名文人锒铛入狱以致身亡，并给他们加上反儒、反清、缺少道德及其他罪名，以铲除非正统的所谓不良影响。所有这些审查造成了一种通过思想控制的古板的儒家道德至上的高压气氛。

在这种气氛下，道德方面的压制遍及社会各领域，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判断文学作品时，首先是看作者的个人道德行为，而不是其内在的文学价值。作者和文学不是分开来看，而是把道德作为两者的首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承认像李渔这样有时不是很传统而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文学价值，他的“不道德”行为则成了评价他的杂剧、传奇和小说的主要因素。他那些曾经受到高度赞扬的杂剧传奇，现在的评论有褒奖也有保留，而他的小说干脆被斥为公开的散毒，甚至被禁止。中国的文学传统向来对戏曲比对小说更为看重，并认为小说与作者的性格特征的联系更为紧密。在清朝一代，对李渔不公正的指责一直也没有得以澄清。

清朝人把李渔看成是有伤风化、放荡不羁的文人和淫秽描写的作家，这种形象长时期影响了他的文学声誉。在批评他的文学时总离不开他的道德和性格。更有甚者，有些文学批评家实际上不是批评他的小说和戏曲，而是挑剔他“不道德”的人品作为评论。即使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在笠翁名下出版的书名也暗示着色情内容。^{〔1〕}这些书除了书名是杜撰的以外，其实是根据李渔的名作《闲情偶寄》而来，这本文集议题涉及广泛，其中含有相当出色的戏剧评论。给这本严肃的著作冠以一个带有感官猎奇的书名，显然是毫不负责任的书商为达赚钱目的而想出的一种手段，但

〔1〕 很容易举出两个例子来，如 1923 年由江左书林出版的《李笠翁香艳丛录》以及 1935 年由大通图书社在上海出版的《李笠翁行乐秘术》。其他最能显示对李渔深存偏见的，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包括《续编》和《拾遗》）。还有一些评论对李渔的戏曲和小说虽有表扬，但对他的人格和不道德的行为表示遗憾，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台北 1971 年再版），1：131—132；2：366。